特稿

肖潇

作者肖潇为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编委会成员

中国民主季刊
第 4 卷 第 4 期
2026 年 10 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矢志不渝的研究：文革 60 周年北美研讨会述评

编按：2026 年 8 月 18 日，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编委会组织召开了“文革 60 年：中国和世界的回顾和环顾”的网络研讨会。会议对文革研究已有的定论和固见提出了新挑战，但并不限于文革本身的史实和课题探索，还讨论了当今中国和国外的文革现象。在这个追记中，肖潇概述了会议的主要内容和自己的感受。

光阴荏苒。1966 年爆发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觉距今已经六十年了。尽管在它的发源地 —— 中国大陆没有任何纪念和研讨活动，但在北美，却没有忘却这一被中国执政者刻意忘却的历史。8 月 18 日，由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编委会主办、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和纽约博登书屋协办，召开了“文革 60 年：中国和世界的回顾和环顾”的网络研讨会。会议为期一天，参加者有来自美国、加拿大和中国的二十多位文革研究学者。与会者有两大鲜明的特点。首先，年龄上都铭刻着“文革一代”的特殊印记：文革的亲历者。他们中的年高者，早已经踏上了人生“古来稀”的八十多岁的高峰。最年轻的，也已经六十二岁，走近了退休的门槛。其次，他们不仅亲身经历了中国文革的风浪，还亲眼目睹了世界性的文革的返潮现象。无论是中国习近平的“文革 2.0”，还是美国左派的“身份政治”或右派的个人崇拜和民粹运动，都成为他们责无旁贷的针砭和研究对象。

对研究定论的挑战和理论格局的重构

对文革研究这样一个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积累的学术领域而言，最可贵的无过于对已有的定论和固见提出有理有据的新挑战，从而把研究提

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次研讨会的第一个发言者是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吴一庆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从文化革命到政治大革命：文革源起与发动再探》。这一题目使我们想起了吴教授在文革 50 周年的研讨会上的相似的演说，在那时他提出了目前学界对文革起源的解释常常有一种“倒写历史的时间错置”。比如，他认为“打倒刘少奇是文革运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1] 当时他的见解虽然也有一时的振聋发聩之处，但是还远谈不上蔚为大观的一家之说。这十年来，吴教授已经就此课题在撰写三本英文专著，其中一本，《没有脚本的革命：打倒刘少奇与文化革命》不久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在他新的演讲中，十年的钻研厚积薄发为一系列系统性的新阐释。第一，他反对文革发动是一场毛泽东预先精心策划的“预谋论”的叙事范式。认为文革发动的历史轨迹并非是单一、连续线性的进程，其进程与最初设想之间可能存在重大错位与变异。第二，文革始于文化领域的斗争是不争的事实，但难以证明这是毛泽东发起一场“政治大革命”的谋划。即便是《五一六通知》和 1966 年 8 月份的《十六条》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论和运动边界。后者实际上标志着“文化革命”成为“政治大革命”的一种“再发动”。第三，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足以证明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历史过程的不可预测性和历史行动者的多重互动推动了不期而至的事件异变。比如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是一种意外的非理性行为。由此，“文化革命”偏离原先的轨道，运动的目标、范围、方向与方法均发生重大变化，造成了包括刘、邓在内的一大批高级干部落马。虽然我们都知道：无论是文革起源的“预谋论”，还是吴教授对它在理论上的新挑战，都在史料和立论上有其依据。但是，这一挑战无疑建立了新的分析范畴，开辟了一种新的历史叙述的

可能性。

如果说吴一庆教授的新说主要还着力于对旧说的有力挑战，那么斯坦福大学许成钢教授的发言《文化大革命的制度基础和制度成果》更显示了一种对宏大理论格局的重构。许教授的论述首先使用了“制度基因”的概念，他认为：中国当代极权制的制度基因来自苏俄的极权主义制度。但中国传统帝制的制度基因则决定了来自苏俄的制度基因在中国被吸收和被改造的方向和过程。大跃进和文革是改造苏俄制度基因的关键阶段。在造成极大灾难的同时，这两个运动把来自苏俄的经典极权制改造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管理的极权制。在这种区管式极权制里，全社会大部分的经济和行政不是由中央机构，而是由各级地方党政管理和运作的。九十年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大引擎的乡镇企业更直接是在文革时期社队企业基础上发展而来。区管式极权制的治理结构构成了文革后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转型的制度基础，使私营部门得以在极权体制内部迅速生长和扩张，并由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列宁主义新经济政策，帮助中共不仅摆脱了统治危机，而且变得更有韧性。许教授的这一由不同经济形态衍生的对文革前后近百年的因果解说，不一定能使所有人都认同，但毫无疑问是一个高屋建瓴的新的理论构架，值得学界在震惊之余做更深入的探讨。

类似于许成钢教授的纵横史观式的探寻，还有裴毅然教授的《文革前后的“大外宣”》和程映虹教授的《1972：民族主义符号的崛起——文革与中国道路再讨论》这两篇发言。前者极为细致地追溯和梳理了中共“大外宣”的源起、发展和成败，后者则以文革中并不算显眼的1972 年为时间截面，以那一年里的“针刺麻醉与中医中药”、“元

谋人、马王堆”的新闻事件为契机，分析了民族主义如何在文革那段文化单调、物资匮乏、个性萎缩的时期成了少有的精神刺激，其深层心理，未必和“祖上曾经阔过”和贪大慕强这类民族主义情绪没有关联。这种社会心理，延续至今就是对中国崛起和“国家统一”的大众支持。

对传统研究的新发掘和新见解

会议的很大一部分发言仍然聚焦于文革本身的史实和课题探索。但这些研究绝非是单纯的老调重弹，而是推陈出新的新发掘和新见解。美国宾州约克学院的周泽浩博士在会议“自由发言”议程中的发言题目是《文革初期反孔运动的再考证》。在人们的固见里，文革中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莫过于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但是周博士的新考证却告诉我们：其实文革中对孔府、孔庙和孔林（“三孔”）造成最大损害的并不是北师大的两百名红卫兵，而是当地坚决支持他们的行为，积极充当“马前卒”的“贫下中农们”。这些农民（不少还是孔家后裔）对“三孔”遗产的破坏是出自于敛财的疯狂，因而是最有毁灭性的长期劫掠行为。文革中造反派的时运突转，缘起于 1968 年夏天的所谓全国造反派座谈会的“北航黑会”。但是长期以来，从没有人对这一重要事件做过认真的研究。来自芝加哥的文革研究学者谭加洛（笔名阿陀），近年来对这一重要课题做了潜心的梳理和挖掘。在他题名为《“北航黑会”的来龙去脉》的发言中，他指出：所谓的“北航黑会”是因两广牵头的全国造反派对抗《七·三布告》，呼吁制止大屠杀的“公车上书”。

评价文革的造反派问题，不仅在文革中是热门的话题，至今为止还是研究的“显学”之一。本次会议的发言中，中国文革研究学者，社科院的徐友渔教授以《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和造反派》为题，发表了对这一素有争议的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文革中的造反派并不是一群想趁机作乱的坏蛋，而是遭遇和反应都正常的中国人，是当时中国的国情——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与毛泽东驾驭文革运动走向的特殊手段相结合的产物。造反派也显示出在政治思维、行为方式以及性格上的多样性。在文革中，造反派既有盲目服从、“誓死捍卫”的一面，也有自作主张、追求自己目标的一面；既有运动初期坚持正义与平等，抗拒镇压的一面，又有运动中期得势后就得意忘形，压制他人的一面；文革以“四人帮”的束手就擒结束时，原造反派中人们的反应也大不相同，有人悲伤有人欢呼，这说明人们对于文革，对于造反的态度是随形势的不同而变化的。——应当说这些都是理性公允之论。

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中的角色人所皆知。但人们不知道的是：研究中央文革小组的学术论文却寥寥无几。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民运理论家胡平题名为《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中的角色及其命运》的论文，从中央文革小组的角色、成员构成、历史上与其相似的机构、毛对文革小组的利用和抛弃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剖析。尤其是文中利用江青的名言“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2]和陈伯达的悲叹“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3]，把中央文革“打手走狗”和“替罪羊”的双重政治作用刻画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这一发言，其实是填补了热门话题中的研究空白。无独有偶，另一个文革学者丁凯文的《文革时期的叶剑英——浅谈被官史扭曲的历史真相》

也同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在他的笔下，素来被中共官媒一边倒地溢美颂德的叶剑英的文革功过被公正地褒贬，还了他“党政军中仅次于周恩来的政客型人物，实乃中共政坛上的不倒翁”的历史真面目。

直面中美两国新出现的文革现象

论及二十一世纪的文革现象，发生在中美两国政坛上的个人崇拜等现象都将是很难被绕过的课题。在中国，在文革被公开否定的三四十年后，新上台的习近平竟又开始了一个称之为“文革 2.0”的执政时期。在美国，在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执政的两个任期内，也开始打破美国民主政治传统、不遗余力推广个人威权。当一个有风骨的知识分子在美国谈论吸取文革教训时，是不能够对发生在他身边的文革现象视而不见、甘当犬儒的。所幸的是：会议收到了三篇论文，对从毛泽东、习近平到川普的文革思维、理论和现象做了深入的分析和全面的批判。

第一篇是来自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荣休教授宋永毅的《权力崇拜的返祖：从习近平到川普的个人崇拜现象》。宋教授在他的发言中非常系统地比较分析了 21 世纪发生在美中两国的个人崇拜返祖现象。论文从“个人崇拜”的理论界说切入，揭示其本质是对集权与绝对权力的崇拜。其次，他又探讨了独裁者借由民粹主义运动打破任期限制、追求终身执政的内在动力；剖析了极权 / 威权政治下“庇护者 - 被庇护者”双向交互作用所引发的结党营私与党同伐异。再次，他还从精神病理学视角探讨了领袖病态人格（恶性自恋与偏执型人格障碍）在政治造神中的决定性影响。最后，他对比了马列主义体制

（及其“核心论”）对个人崇拜的滋养，与美国三权分立宪政框架对个人崇拜的制度性抵制。该论文对川普个人崇拜的最后结论是“如果以建立覆盖全国、跨党派且制度化的个人崇拜为标准，则其效果非常有限，并受到美国制度、法律和社会多元性的明显制约。”

威斯康星大学荣休教授郭建也以《反智、反体制的群众运动：川普革命对文明的挑战》为题对中美两国的文革现象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比较分析。该文以中国文化大革命、纳粹德国群众运动与川普时代美国政治的比较为切入点，提出“反智、反体制的群众运动”可能成为不同政治体制共同面临的危险。文章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用“文化”名义掩盖其以思想统一、压制知识与独立思考为特征的反智运动。作者据此分析川普“革命 2.0”的两个核心面向：一是以“排干沼泽”、攻击媒体、削弱政府机构、强调个人忠诚等方式冲击既有制度；二是通过削弱教育、科学、大学及文化机构，推动反智和反科学政策。文章进一步指出，川普政治的危险不仅来自领导人的个人倾向，也来自相当规模的群众支持以及美国社会的政治极化。虽然法院、国会和宪法仍对权力扩张形成制约，但美国制度本身亦存在总统权力过大等结构性问题。作者最后以德国和中国的历史经验警示：当体制内部的领袖为了巩固个人权力而煽动群众反对制度时，运动可能走向反智、反文化乃至反文明，因此这些历史经验应成为美国反思民主危机的一面镜子。

第三篇探索和比较中美文革思维的论文来自现居美国的澳门大学荣休教授郝志东，题名《“文革思维”的普世性：从施密特、毛泽东到川普》。作者以三者的政治思想与实践为比较对象，探讨“文革思

维”即“斗争思维”的普世性。郝教授将其概括为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非友即敌、你死我活的二分思维；以极端化、专制化和非人化为特征的思维方式；以及以暴力消灭异己的政治逻辑。文章通过德国纳粹、中国传统及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当代美国政治等案例，说明这种思维并非中国“文革”所独有，而具有跨时代、跨社会的普遍表现。作者认为，现实主义因迎合人性中的利益、恐惧和权力需求，具有一定逻辑自洽性和实践效力，但其极端化会侵蚀人的尊严、制度规则并造成严重灾难。论文最后主张以“现实的理想主义”结合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在承认利益和现实约束的同时，坚持正义、对话、规则与非暴力，以制衡并超越“斗争思维”。

文革 60 周年的网络研讨会虽然只进行了一天，但硕果累累、深广度兼备。意犹未尽的与会者都相信它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开端，更会是一个走向更大成功的开始。在会议结束时，与会者曾谈及下一个十年的研讨会，可能不少年事已高者会因生命的消逝而缺席，但大多数学者却如此谈笑风生：“只要还活着，一定会参加文革 70 周年的研讨会”。这种对文革研究坚忍不拔、矢志不渝的执着，使人不由地想起二战盟军统帅之一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老兵不死，只是凋零”（*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的豪迈名言。[4]

注释

1 宋永毅主编：《文革五十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上）》，纽约：明镜出版社，2016 年，第 16 页。

2 纪思道：“毛的遗孀江青自杀”，纽约时报（中文版），1991 年 6 月 5 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60715/archive-jiangqing-suicide/

3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 年，第 675 页。

4 这句名言出自麦克阿瑟于 1951 年 4 月 19 日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的著名告别演说，演说标题通常被称为“国会告别演说”（Farewell Address to Congress）或“老兵不死”（Old Soldiers Never Die）。